

· 药物史研究专题 ·

生境之困：清末民初中国传统医者的 金鸡纳论争

吴博文¹，鲁子涵²

(¹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汉 430079；² 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南阳 473000)

摘要：自西学东渐开始，西医西药便不断输入中国，随之传入的金鸡纳也渐渐成为民众的日常医疗用药，引起赵学敏、裘吉生、包识生、刘丙生等中国传统医者的关注。他们对金鸡纳的认知逐步从“谜药”转变为“妙药”，并于近代本土化的过程中，以《神州医药学报》为主要阵地掀起了一场关于金鸡纳药性的论争。这场论争虽扑朔迷离，但基于金鸡纳呈现的研究路径和观点却清晰地展现出近代中国传统医学、医者所面临的“焦虑”与“生境”以及面对冲击时医者的努力与抗争。

关键词：金鸡纳；中医；知识传播；中西交流；《神州医药学报》

DOI：10.16307/j.1673-6281.2023.04.002

中图分类号：R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6281(2023)04-0306-10

Survival Dilemma: The Controversy over Cinchona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Practitioner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U Bowen¹, LU Zihan²

¹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²Nanya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Bureau, Nanyang 473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s, western medicine began to be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the imported drug of Jin Ji Na (金鸡纳 Cinchona) gradually entered routine medical practice of the folk, which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octors such as ZHAO Xuemin, QIU Jisheng, BAO Zhisheng, and LIU Bingsheng. Their recognition of Cinchona increasingly changed from “mystery medicine” to “miracle medicine”, and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ing the medicinal material in modern times, a debate on the medicinal properties of Cinchona was set off with a focus on the *Shen Zhou Yi Yao Xue Bao* (《神州医药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ine*). Despite the complexity in the debate, the research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2JJD770043)

[第一作者] 吴博文 (ORCID: 0000-0003-3056-1872), 博士生, E-mail: lucktucker@126.com

[通信作者] 鲁子涵 (ORCID: 0000-0001-6494-7461), 科员, E-mail: 963054708@qq.com

paths and perspectives based on Cinchona clearly show the “anxiety” and “survival dilemma” confron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actitioners in modern times, as well as the efforts and struggle by them in face of cultural impact.

【 Keywords 】 Cinchona; Chinese Medicine;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Chinese and Western Exchanges; *Shen Zhou Yi Yao Xue Bao* (《神州医药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ine*)

15世纪新航路开辟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中西方文化交流更为密切,西学东渐逐渐成为历史潮流。金鸡纳^①即在该时期传入中国。金鸡纳作为西洋之药,如何将其纳入中国传统医学知识体系,如何认识其四气五味,如何在处方时七情配伍,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医者往往将一些社会问题如中西之争、传统医学是否科学等置于讨论框架中,使得金鸡纳被赋予多重历史面向和文化意涵。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中西医论争^②、金鸡纳引进、流传的医药史^③以及引种、扩张的物种史^④层面,但关于中国金鸡纳药物知识传播、本土化的研究较少。再者,学者在论争研究中常聚焦于传统医学和西方医学的二元对立,很少关注到其本身在某一历史阶段的发展与选择,而药材本身不因医理的差别而受到不同流派医者的偏见。本文从中国传统医学容受西洋药材的过程来看金鸡纳在“生境”^⑤中的应对与抉择,并思考金鸡纳所带来的历史审视。

一、金鸡纳的引入:从“谜药”到“妙药”

金鸡纳发现于南美,其因卓越的治疟功效而备受青睐,并逐步走向全球。金鸡纳引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已不得而知,但康熙帝曾服用金鸡纳治疟,说明至迟在清初时已引入中国。康熙帝患疟时,中国人可能还未曾见过植物态的金鸡纳,人们能够见到的金鸡纳已是制成品。从康熙帝服用该药的记载看,此药如“谜”一般“在北京还不为人知”^{[1]289}。内廷之人对此十分好奇,他们想要知道金鸡纳“从何而来,效果如何,能治哪些病”^{[1]289}。御医对金鸡纳持怀疑态度,并不同意康熙帝服用金鸡纳,但经内廷两轮试药,

① 金鸡纳一词含义比较丰富,在不同语境下其可以指代植物金鸡纳树及与药物有关的金鸡纳霜、金鸡纳丸、金鸡纳碱等等,甚至有时与奎宁等同。本文的研究对象金鸡纳主要指作为药物的金鸡纳,农林学意义上的金鸡纳树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另,虽然金鸡纳霜在史料中比较常见,但部分史料尤其是早期史料常使用泛称金鸡纳,且金鸡纳霜的概念在后期有所缩小范围过狭。因此带有药植、药物双重属性的“金鸡纳”一词更适合于本文的语境。

② 相关研究可参见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该书初版为1989年,因此将其列前);邓文初:《“失语”的中医——民国时期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分析》,《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第113-120页;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张效霞:《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B. Andrews, M. Bullock: *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244-266.

③ 如赵璞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第37-48页;谈玉林,谢惠民:《国外药物传入我国史略》,《药学通报》1986年第8期,第494-496页。这些研究中均涉及金鸡纳,但多为史实角度的考辨,不够深入。

④ 此类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张箭:《金鸡纳的发展传播研究——兼论疟疾的防治史(上)》,《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第61-74页;张箭:《金鸡纳的发展传播研究——兼论疟疾的防治史(下)》,《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84-95页;王林亚:《改变世界的奎宁:全球环境史视野下人类对金鸡纳的认知、引种及影响(1853—1939)》,《史学月刊》2022年第3期,第102-112页,从全球史视角对金鸡纳的引种和传播进行研究。具体到某一区域,顾雅文的研究最为深入,如顾雅文:《日治时期台湾的金鸡纳树栽培与奎宁制药》,《台湾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47-91页等文,从史实到文化层面将中国台湾的金鸡纳研究推向了一个相当的深度。

⑤ “生境”是一个生态学概念,原指生物个体或群体所依赖的区域生存环境。本文意欲使用其类比意,将中国传统医学在近代所依赖的(社会)环境视为生境,由此考察其面对近代剧变,社会链条震颤而进行的自我调适。

皇帝还是“喝下金鸡纳霜……病情日益好转”^{[1]290}。经此一事^①，金鸡纳从皇室层面证明了其有效性，逐步为国人所知，并开始从“谜药”向“妙药”转变。康熙五十一年（1712），江宁织造曹寅患疟，医生用药不能见效，遂请求赐药。朱批写到：“金鸡掣^②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往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2]可见，江南士绅虽对金鸡纳药名、服法、禁忌等不甚了解，但已知其存在和疗效，因而上折求药。

乾嘉时期，钱塘人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六《木部》中收录金鸡纳，称之“金鸡勒”。其所见为原始药材——金鸡纳树枝，由宗人晋斋自粤东带回，据其述金鸡纳“味微辛，云能走达营卫，大约性热，专捷行气血也”^[3]。赵学敏在书中亦记有该药治疟和解酒的功用，并附有“澳番相传”的用法。即治疟时，“用金鸡勒一钱，肉桂五分，同煎服，壮实人金鸡勒可用二钱……解酒，煎汤下咽”^[3]。由此可见，宫廷并非民间金鸡纳知识的来源，诸如赵学敏之类的民众获取相关药物知识主要倚重岭南。再者，时人侧重传述金鸡纳的有效性，并尝试从传统医学的角度理解该药的药性、用法、配伍，这从侧面证明此时人们对金鸡纳的态度已从质疑转向审慎用之。

19世纪上半叶，西人在南亚、东南亚的殖民地建立种植园逐步推广金鸡纳的种植，并开始对制成品进行实验分析。此外，西人在鸦片战争后大量进入中国，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交流日盛，这使得金鸡纳输入增多，也便于民众接触与了解。此时，旅居中国的西人也在其所举办的报刊中刊登涉及金鸡纳树的西文科普文章。创刊于清同治六年（1867）的《The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上海晚邮》）在1878年的8月26日和9月26日分别刊登了“Cinchoan Febrifuge（《金鸡纳树解热药》）”^[4]和“Cinchoan As A Cure For Intemperance（《金鸡纳可以治疗酗酒》）”^[5]，二文分别就金鸡纳在印度的种植情况、效用及美国发现金鸡纳制品对酗酒的抑制作用等进行报道，这也是中国能看到的较早以科学叙事方式对金鸡纳树及其制品进行引介的文本之一。创刊于清光绪六年（1880）的《画图新报》^③在其首期即刊出文章《论金鸡纳霜真伪》，并写到金鸡纳“色有白黄红之分，一名桂掣，味极苦，用磺强水制成，色洁白，金鸡纳霜以此为正”^④，将该内容置于首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金鸡纳在当时较受人关注，其对金鸡纳霜进行辨伪，也从侧面证明此类药物需求上涨，时人存在潜在的甄别需求。此外，上海逐渐成为外商向中国运销金鸡纳的核心城市，这一变化突出的表现为沪上报刊中金鸡纳广告的出现并逐步增多。如上海著名的老德记大药房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刊登宣传金鸡纳奇效的中文广告，该药房将金鸡纳霜列为驰名药品，并宣称其售卖的金鸡纳霜对“三阴疟疾四日两头愈发刷愈灵，更称神奇，无出其右”^[6]。至民国时期，上海逐步超过广州、汉口、天津等口岸，成为进口西药的重要商埠。林美云对1913—1918年江海关药物进口的统计也表明，金鸡纳是江海关西药类中价值占比最重^[7]的进口药物，这也是后期金鸡纳的论争能够在上海及周边刊物呈现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

综观上述情况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至清末民初之时，社会对金鸡纳在治疟中所起的作用已比较认可，金鸡纳在国人的认知中已实现从“谜药”到“妙药”的身份转变；第二，虽然《本草纲目拾遗》已收录金鸡纳，但随后中国境内生成的与金鸡纳有关的医学知识文本多为西人撰述并以西学、西药角色登场，传统医学对金鸡纳的理论认知未有较大突破。然而金鸡纳在医疾中却愈来愈重要，这种学理认知的相对滞后，为后续药物的论争提供了讨论空间。

① 关于此事的详细过程参见潘大为：《知识与权力的传奇：康熙与金鸡纳史实考辨》，《科学文化评论》2016年第1期，第88-101页。

② 原文为满文，此页注一对此解释为“金鸡掣，即奎宁”。

③ 原名为《花图新报》，后更名为《画图新报》，因较长时段称其为《画图新报》，因此笔者根据习惯，统称其为该名，但本文所引用的为创刊号，当时仍名《花图新报》。

④ 《论金鸡纳霜真伪》，《花图新报》1880年第1期，第104页。

二、金鸡纳的药性：从温热到寒凉

清末民初，传统医界涌现出不少社团，如绍兴医药研究社、神州医药总会等。这些社团除增进医界联系外，往往还举办医学教育活动、创办刊物等，并借此向社会传播医药知识，这为医者在金鸡纳药性层面进行对话提供了平台。此外，金鸡纳能够受到诸多江浙皖医者的关注，同清末清初出现的温病学派有关。其一，金鸡纳所治之“疟”与温病关系密切；其二，数百年无休的“寒温之争”^①对医者认知和使用药物产生了较大影响。赵学敏在其《本草纲目拾遗》中提及金鸡纳时便关注此药寒热，并言该药“大约性热”^②，这是国人对金鸡纳寒热之辩的肇始，但由于此时国内金鸡纳并不常见，因而该论未引起过多争议。晚清时期，金鸡纳治疟的有效性被医家与病家广泛认可，但传统医学理论中大多疟症^③，如正疟、温疟、瘴疟等多用清热之药治疗，这就与赵学敏所说金鸡纳“性热”有所冲突，故人们开始质疑该结论，认为此为耳食之言。中医界元老裘吉生在论及金鸡纳时便对赵学敏的看法予以批判，也由此引起诸医者对金鸡纳药性的讨论。

（一）寒热之辩

1908年，中国传统医学之元老^④裘吉生在其创办的《绍兴医药学报》首期刊发《药物学金鸡纳霜考》一文，他发现金鸡纳之成分（桂尼精）“形如结冰，颇棉软，味极苦……大书解热又入补剂，又称解疟有殊功，无论往来疟疾，常热疟疾，危险疟疾皆主之。兼治虚弱脑气、筋痛久痰、嗽久鼻渊，久泄泻，胃弱，大头瘟等症，其为凉而且行之性可决矣”^⑤。他分析了金鸡纳化学成分的性状即体、色、味，得出金鸡纳性凉的结论。因此裘吉生对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所记进行批判，认为其所言“性热，以传闻之说误尽后人”^⑥。在裘吉生看来，确定药性凉热是认识金鸡纳的基础，并称：“他国人已研究数百年，视为至宝之药，而我国人尚凉热之莫定，视若毒物，真可怪也。”^⑦但周寿人观点与此不同，他在1912年刊文中提出“金鸡纳霜……性热无疑”“化学本草将纳霜并苍术同列于解热凉品……苍术中国本草皆谓其苦温性烈，而化学又称其解热清凉”，因此称“余谓纳霜之性盖亦与苍术同”^⑧。周寿人的论述路径比较特别，他试图通过演绎推理的方法将金鸡纳解释为性热，但这一推理过程的命题和结论之间并无直接逻辑关系，而只是结合西医理论将金鸡纳与苍术归为一类，并将中医传统药理学理论杂糅入内，认为苍术如此，金鸡纳也必然如此。

1914年，伤寒大家包桃初之子包识生^⑨也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在《神州医药学报》的问答栏目刊出其对金鸡纳的疑问：“西医用金鸡纳治疟，中医用信石治疟皆灵验，一热一寒，其效果相同，是何理由。”^⑩由此也引发了其他医者对金鸡纳药性的思考。围绕该药物的论争就此开启，并集中刊发于《神州医药学报》。《神州医药学报》于1914年第8期刊登了包识生对读者质疑函件的回应，此次包氏明确其观点，“金鸡纳性大寒，砒霜大热”，并对质疑者黄君“鸡纳为热，砒霜为寒”^⑪的结论表示怀疑。另外，得益于包识生所提金鸡纳与信石（砒霜）^⑫之比较，从此医者讨论该药时往往兼论信石。针对包氏的回应，谈惠愚在该年该刊第9期发文，其认为：“包君意以为金鸡纳霜性大寒，而竟能与信石同一收治疟之效，故

① 这里的“寒温之争”指的是“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数百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温病”是否属于“伤寒”，经方能否用来治疗温病。

② 还有一种寒疟，但寒疟较少，寒疟多用温阳之药。

③ 余伯陶：《包桃初先生传略》，见包识生著：《包识生医书合集》，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3页。（该传略作于1915年）

④ 信石又名砒石、砒霜、白砒、红砒，味辛，大热，有大毒。因其与金鸡纳一样能疗诸疟，而且在一些医者认知中信石与金鸡纳药性不同，所以在此次论争中常被拿来与金鸡纳做比较。

于第一期报内有是何理由之问。”^[13]在谈愚叟看来，虽然西医用西药强调最终疗效，但他们对寒热“亦非漫无辨别”。西医初用金鸡纳，“隔日不应，改用信石数厘治之……金鸡纳性虽热，不似信石尤热而毒，是以次第用之”。可如果我们借此认为“金鸡纳与信石均非寒性”^[13]，那不过也是耳食之学。可见谈愚叟对判断金鸡纳和信石药性几何比较审慎，持保留态度，其希望有“兼通中西医学之彦……能确知二物之性，尚祈详示以期解决”^[13]。谈愚叟虽未明确其欲以何理论路径来解决此问题，但他对从西医临床实践角度来说明该药在传统医学中药性是何，显然是消极的。或许包识生也发现自己如此之说令大众生疑，故又在该期谈愚叟文后附上了对金鸡纳的详细阐释。

此次刊文包识生的态度缓和不少，其在文章开头只言“金鸡纳霜之性质，前期已略言之，兹复蒙谈翁重为辩难……鄙人不敏，谨将平日所用金鸡纳之经验说明于下”^[14]。他认为确定药物药性的理论路径应是“形色气味辨之，然亦必徵诸服后之经验始可断言也”^[14]，即始于四气五味，终以临床断决。包识生认同谈愚叟所说西医临床实践中虽辨寒热但无确言，所以可用“中医之学理说明之”^[14]。首先，他认为“以苦味辨之，金鸡纳性寒也”^[14]，加上其观之病者服用金鸡纳后多现寒象，治疗时以香砂六君子汤为底方，加味“姜桂和鸡纳为丸服之，即无寒症之现象。可知鸡纳性属寒也”^[14]。其次，砒霜病者多服之，“口破肠烂，全体发热如烧，诚大热药”^[14]，确也无疑。而西医在金鸡纳治症无效后使用砒霜取效，是因“寒体服鸡纳不宜，而当以砒霜热剂，即愈也”^[14]。其后，任养和^①也回应了谈愚叟的疑问，其从金鸡纳的基本性状入手并结合病者服用后的临床表现，分别提出了金鸡纳本体和制后的不同性质。他认为金鸡纳分“红黄白三种，白者，性和平，红黄二种性多烈，世所通用惟白色居多……此药味苦性寒”^[15]。此外，药物炮制后药性发生改变，“盐制，名为盐强桂尼纳……其色洁白，其质轻，其性和平”“磺强水制，名为磺强桂尼纳……其色淡黄，其质重，其性热甚”^[15]。再者，其借西医临床用药之情况进行演绎推理，西医“寒重用乙必格制散，热重用安知必林，寒热往来用金鸡纳霜”，任养和“以此推之，（金鸡纳霜）寒热相等无疑矣”^[15]。针对信石治症，其认为“信石乃大热大毒，非煨透，不可轻用”^[15]。而“金鸡纳与信石均能治症”在于所针对的病机不同，“鸡纳重于驱寒泄热，信石重于扶阳逐痰。凡治症者，初则利用金鸡纳，久则利用信石”^[15]。任养和的研究路径有观察天然药材——金鸡纳树皮性状而推之的性味，有观察其制后——化学精质性状而推之的性味，还有兼参西书临床运用之成药——金鸡纳霜的差异而推之的性味。至于信石大热却能治症，其认为这与金鸡纳和信石所侧重的病机有关。任养和论断的落脚点虽仍为传统医学，但较之前述医者，其将西医理论与传统医学观点糅合得更显紧密，而不是在中言中、在西言西，因此其对金鸡纳药性的分型也更多更复杂。

如果说前述诸医者措辞的传统医学色彩比较浓厚，那么该年朱阜山所刊论说则直接彰显西学特点。其虽也从药物性状谈起，但所述产地、发现、释名、生理作用等均以西名如“盐酸规尼涅、硫酸规尼涅、枸橼酸规尼涅”^[16]及西理如“其溶液注入皮下则诱起炎症，触于粘膜则觉疼痛”^[16]呈现，且其只是在标注病名时加注传统医学称谓，以及第七、八部分对性味解释为“颇苦，为清凉”^[16]时略有落脚传统医学的意味，其他皆取诸西学。至于其如何得知金鸡纳之性味，该文中尚未明示。而关于信石与金鸡纳治症的问题，朱阜山另有专文阐释。其在《信石考》中写到信石“性微凉有剧毒”，并否定李时珍等人的推断，认为：“凡物性之寒暖必以物理之说，化学分析之功绳之，方为正确。时珍、大明等说究以何者为依据，殊觉茫然，欲证明其为凉性为热性，参观化法条目自明。”^[16]其所说化法即化一分信石所需浓酒、沸水、冷水等的数量。由此推之，其言金鸡纳“颇苦，为清凉”的性味特征也应大抵以化法分析得来。朱阜山认同前人先服金鸡纳无效后再用信石的疗法，并详述英美学说中信石与规尼涅的用法，至于二者之

① 任养和，“讳桐轩，医号养和。江苏广陵之东乡人……诞生于清咸丰元年（1851）六月初十日，寿终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五日”。参见卢育和：《来件：先业师任养和先生行述与追悼》，《医学杂志》1936年第87期，第61-65页。

于症同能起效之医理与药理并未谈及。论争及此，可见诸医者在谈及金鸡纳性味时，借助西学出发寻求告解的比重有所增加，这种现象引起了医者刘丙生的注意，随之，其在该年《神州医药学报》第12期刊文对此予以抨击。

刘丙生^①以“中医之腐败，败于未明《内经》六气之真理也；西医之蓬勃，蓬勃于中医附会其说也”^[17]开篇，点明其对五运六气的认可，随之以此来推之金鸡纳的形、性、能、力。刘丙生认为“夫金鸡纳，树名也……取其树之枝叶，煎炼成霜。其性与中医草果霜相等。其味苦，其用燥，非寒非热，实阳明燥金之正盛气也”^[17]。可见其认为金鸡纳霜的药性为“非寒非热”，并十分重视金鸡纳“燥湿”之功用。依此理论路径，刘丙生对砒石也提出了一定看法，其认为“砒石性燥，亦燥金之胜气所生也……因其毒烈，有似火之象也。其实燥极而已”^[17]。至此，这些医者对金鸡纳乃至信石药性的阐释已有数种，理论路径除传统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法象药理外还兼有据临床推理及借鉴西学之说，因而阐释之义有诸多不同。论行及此，医者对金鸡纳的论争稍有平息，不过由探讨金鸡纳所引起的“信石”之争远未结束。

（二）金鸡纳、信石与砒性

朱阜山发文之后，医界先觉钱存济^②向《神州医药学报》去函，对其信石理论提出质疑。朱氏回应中认为这种质疑是由于钱存济“不谙化学为解”^[18]。因此朱氏撰文从西学之理出发再次详释其理论生成过程。他认为信石是矿物，想要明确矿物性质就必从矿物学出发分析。他提出“铋硫磺烛火能熔，是为大热之证。砒石吹火决不能熔，是为大寒之证”。因此“信石虽薄片亦不易熔，是乃凉性无疑”^[18]。随后，其又借助岩石成因论认为“信石乃属水成岩……绝非热性”，而且其考察发现信石的产地“并无火山山脉经过”，因此“信石之为凉性更无疑矣”^[18]。对钱存济质疑为何信石既性凉而服用后却腹热如焚，朱阜山提出“寒热温凉乃药品之性，非药品之作用也”“服大热性药之腹热如焚，乃药物之自身作用，服凉性之剧毒药，亦有腹热如焚者，乃以药毒之作用……非因药之性”^[18]。

钱存济阅后又刊文予以驳斥。针对信石不易融而为凉性的观点，其提出“市中以信石熏烟避蚊，是信石亦能为火所熔，此足证为热性也”^[19]。针对岩石成因论与凉热之说，其认为信石产地“古信州即今江西广信府，非产于河南信阳也。况信阳为古申国，向不产生信石”^[19]。针对引起腹热如焚的两种情况，其认为此中有细微差别，服凉性药“系寒凉过多，克伐正气……自有之真阳发越于外”，服热性药腹热如焚“系大热之性烧腐肠胃令人发炎……服热性药不必腹热如焚者断未之见也”^[19]。针对“中信石毒者，其人大渴酷饮发热如狂”一条，钱存济使用老鼠试验后见“（鼠）须臾必渴若得水则活能解，否则辄毙”，并且“严冬时，渔人赤身捕鱼于水必食煨烧信石些许，则不畏冷……足见信石之为热性”^[19]。

钱存济在该文驳朱阜山时也开始带有讥消之意，学理之争有些转向意气之争。其在文中写到“……云云，殆刊印之误欤？幸先生有以教我”^[19]。对此，朱阜山则再刊新文回应。关于钱文所述信石驱蚊的反例，朱氏认为其甚至不知“熔字作何解”^[20]。关于信石产地问题，其提出虽文本征引自李时珍《本草纲目》，但砒石产地有信阳来自“日本柴三博士所著汉药学”^[20]。关于岩石成因论与凉、热二性之关系，其只说此为“西国先哲名言，考无可攻”^[20]。关于钱氏从病机学说分析腹热如焚的原因，其认为“俱系哲学的问题……非本篇所许据科学的理论”^[20]。关于钱氏未见服用热性药而腹热如焚，其提出该论点引自“日本安东寿郎立刻教本”^[20]。对于老鼠试验的结果，朱氏解释为“人与鼠抗毒素之不同”^[20]。此外，渔家服用信石抵御寒冷，朱氏认为这是由于信石“开胃补身，能令各腑多发津液，血液急流之效果”^[20]。

① 刘丙生即刘吉人，晚清医家，选录校勘《丹溪脉诀指掌》。参见赵法新等主编：《中医文献学辞典》，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5页。

② 钱存济，名文广，号春榆，皖之广德人，乃皖省近代医界之先觉也。参见江仁浒：《人物介绍：钱存济先生小传》，《医药研究》1947年第3期，第14页。

朱阜山曾在刊物中自称为中西医汇通学派“丁福保先生之旧弟子”^[21]，从这篇回应也能看出其推崇西学西理，并以所谓“科学”作为判断是否正确的标准，一定程度上带有中西医汇通学派的特点。朱阜山是此次论争中言辞最为激进的医者之一，其在文中对钱存济的批判毫不留情。如其述钱氏不理解“熔”之含义，随之评道：“无暇多所诠释，请尽心检阅字典可也？”^[20]至此，有关金鸡纳药性问题的探讨已逾数年，而最后这场信石之争，也将这场论争推向顶峰。

汤逸生在朱文刊出3期后又于《神州医药学报》刊文，表示其阅该报后对此次“大辨凉热，各有见地，殊深钦佩”^[22]。但他认为“信石与金鸡纳同主治症，而性之激烈亦不相远”，除了探讨药性之凉热外，还应对“金鸡纳有无砒性”^[22]投以关注。病者所购金鸡纳，其“仿单独载有益不载有害……服之而当，简且捷矣，服之不当，则毋论有无砒性，往往反致增剧不可收拾”^[22]。汤氏提出金鸡纳的“砒性”回避了药性凉热之论，而将焦点转向其本人甚至是社会上大多对金鸡纳的服法、适应证的疑惑。其所谓“砒性”实则与其文中所说之“害”异曲同工。换言之，药性凉热各有其理，凉热并非导致“服之不当，反致增剧”的本源，用法、用量乃至危害性才是问题之根本。

诸医者论争至此，并未实现如包识生最初提问时所希望的“所谓学术愈研究而真理愈现，以符倡明医药之宗旨”^[14]。金鸡纳的药性反而在各家针锋相对之后变得有些扑朔迷离。然1915年11月《神州医药学报》停刊^[23]，众医者以该报为舞台的药性之争也戛然而止。总体来看，在1908至1915年间，金鸡纳的论争在以裘吉生、包识生、朱阜山、钱存济、刘丙生等为代表的医者中展开，尤以1914至1915年在《神州医药学报》集中刊发的13篇研究论文之交锋最为激烈。其中，持金鸡纳性寒（凉）、信石性热之观点的医者较多（见表1）。然而，随着论争的推进，寒热的争端趋向缓和，医者开始倾向于从药物的两面性来进行阐释。

表1 金鸡纳与信石药性之辨各医者主要观点及理论路径

医者	金鸡纳			信石		
	寒（凉）	热	其他	寒（凉）	热	其他
赵学敏	-	粤归者云	-	-	-	-
裘吉生	四气五味	-	-	-	-	-
周寿人	-	西医药学 四气五味	-	-	-	-
包识生	四气五味 中医临床	-	-	-	三因制宜 中医临床	-
谈愚叟	-	-	不置可否 西医临床	-	-	-
任养和	法象药理 （树皮）	法象药理 （磺制）	寒热相等 （霜剂） 西医临床 性和平 （盐制） 法象药理	-	四气五味 病机	-
朱阜山	未述理论	-	-	西医药学 法象药理	-	-

(续表)

医者	金鸡纳			信石		
	寒(凉)	热	其他	寒(凉)	热	其他
刘丙生	-	-	非寒非热 五运六气	-	-	燥、性烈 五运六气
钱存济	-	-	-	-	中医临床	-
汤逸生	-	-	不置可否 砒性为重 中医临床	-	-	不置可否 砒性为重 中医临床

注：观点及理论来源于《本草纲目拾遗》《绍兴医药学报》《南京医学报》《神州医药学报》；“-”代表无数据。

三、金鸡纳的隐喻：从药材到生境

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中，容受诸如炉甘石、乳香等外来药物进入传统医药知识体系属常事。在吸纳、运用这些外来药物的过程中，药物的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等逐步明确，炮制方法也日渐规范，甚至实现产销的“本土化”。从辨识性状到结合临床实践知其功效，传统医学容受外来药物已经具有相对稳定的流程。按理说，同样作为外来药物的金鸡纳遵循于此即可，医者与病者无须焦灼。通过前文的讨论即可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医者在讨论金鸡纳药性这一基础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与日俱增的担忧。这种担忧与金鸡纳外来药物的身份无关，而与容受药物亦步亦趋于西学传入、社会剧变有关。药物讨论不仅围绕药物本身开展，还涉及诸多医者对自身的思索和对时代的回应，呈现出中国传统医学的复杂生境。

此时，西医已经提出导致疟疾发病的新知即“麻拉里亚原虫之寄生物存在血中而起，该寄生物由蚊虫之螫刺而侵入血中”^[24]，这已作为普适性的社会知识^①为时人所接受。他们还将这种致病原因与金鸡纳疗疟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医理与药理互为表里的解释框架，并趋于完善。而中医采取的阐释方式是将法象药理学和西学结合，起于对药性寒热的争辩，但最后却趋向于模糊金鸡纳在药性上的寒热之别。相较于西医技术手段的进步和理论的快速发展，传统医学面临着理论困境难以回纳临床实践中的问题。这种生境之困在金鸡纳的论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对论争问题的解决同样也是传统医者对理论的抉择。医者所遇情况不同，使用理论分支不同，难以从宏观层面真正突破原有的理论桎梏，使得问题愈发悬而未决。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医者也意识到诸种观点难以服众是源于理论之困。所以刘丙生提出研究要回到《内经》，这才是解决问题之根本。他认为：“不信《内经》六气之说者，皆坐此不明五行之理，只粗知南北水火二气，不知东西金木二气本来面目甚。且暑邪本气，淫邪本气，亦每每混杂而不能分别。此中医不能振兴之病根也。”^[17]不过，此刻距离以《内经》等著作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之时已有近2 000年之久，再加上社会变局的影响，“无论是古典医学的卫护者还是西医的仰慕者，都无法回避”“他们已经被西医所代表的‘科学’光环所笼罩……（他们）心目中都有一面镜子，即西医以及它所代表的‘科学’”^[25]。因而，一些传统医者对此理论体系有所怀疑，认为这不符合“科学”，不愿用此理论进行阐释。所以朱阜山在理论抉择中将阐释的内核几乎全盘西学化，并以此作为支撑进行辩驳。他驳斥钱存济：“（钱君）所研究之医学似偏乎哲理……因世界潮流所趋，不能不舍哲学的而为科学的。”^[20]

① 这种说法在《妇女杂志》中被归为“家庭疾病”，因此这种致病因素应已被时人认定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知识。

如此这般讨论金鸡纳的药性，只能使得问题越辩论越复杂，西方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间的鸿沟也愈来愈明显，这就与包识生开始提出的“倡明医药之宗旨”渐行渐远。因此，在这场论争中，传统医者越努力越无力，越无力越用力，他们的言辞愈发激烈，逐渐站在西学的对立面。如刘丙生所说：“读古人书不暇前行研究，每反诬古人气运之说为不足凭信，皆浅学之流，离经叛道之梦语也。吾尝辑六淫真经一书，作暑邪本气，辨风木本气，辨八风图说五疫论燥金。疫伤人最多最速最暴。论惜无力刊送行世，俾得唤醒同胞共学之人，以保存中医之血统也。”^[17]

诸医者已不仅仅是为辩明金鸡纳这小小一味药之药性，而是要为传统医学争得一席之地。然1914年前后又恰逢“北洋政府教育部废止中医教育法规颁布”^[26]。这样的背景加上容受金鸡纳不畅，使得争论也表现出传统医者群体的极大焦虑，激烈的言辞正是这种焦虑情绪的宣泄，但理论的困境、西学的压力并不会通过这种宣泄而消失。反而在这场不断尝试、舍弃、更新、发展传统医学理论的论争中动摇了自己栖身的根源，使得其所依赖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愈来愈脆弱，因而近代论争金鸡纳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医学艰难生境的体现。

金鸡纳传入中国后，其传播中心经历了从岭南、北京向上海的转移，逐渐走入中国人的日常，并在医疗和社会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因如此，该药物的论争过程呈现出传统医者在时代生境中的艰难抉择。这些医者尝试加入化学制药、成岩学说、性味归经、运气学说等中西理论去化解临床实践中治法治则和病因病性之间的矛盾，但苦于中西理论框架不同，西医强调的实证精神很难同中国传统医学的辨证思维调适，反而让“真相”越辩越扑朔迷离。在这种生境困局中，传统医者显得额外“焦虑”，其一边从西学出发进行阐释，一边又逐步将自己置于西医的对立面，这使得其生存局面愈发被动。这种削足适履式的理论推进，反而更凸显出西学的权威感。因而时人感叹，“西医之蓬勃，蓬勃于中医附会其说也”^[17]。但此次尝试也是医者积极了解西方医理、药理，并借此来发展、扩充传统医学知识的过程，是近代中医学人努力与抗争的表现。此次实践也证明中国传统医学应该坚持自己的发展脉络、理论框架体系，坚持辨证思维、整体观念等，并建立合理的药物疗效评估机制。通过该机制有效、快速地丰富中药谱系，以应对今日临床实践的变化，并取得实效。即如传统医家所说：“量病者虚实寒热，审症用方，不拘于古人治症之方，而能愈诸症之病。”^[17]可能这也是此次论争给今日中医发展提供的宝贵实践经验与重要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 [1] 洪若翰. 洪若翰神父致拉雪兹神父的信 [M]// 杜赫德.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 上卷.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1.
- [2] 苏州织造李煦奏曹寅病重代请赐药折 [G]//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99.
- [3] 赵学敏. 本草纲目拾遗 [M]. 闫冰, 靳丽霞, 陈小红, 等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8: 210.
- [4] Cinchona Febrifuge [N]. *The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 1878-08-26(4).
- [5] Cinchona As A Cure For Intemperance [N]. *The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 1878-09-26(3).
- [6] 上海英大马路老德记大药房. 上海英大马路老德记大药房驰名各药略列 [N]. 新闻报, 1893-02-22(7).
- [7] 林美云. 进口与自创: 近代上海新药业发展 (1888—1937)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46-47.
- [8] 外埠消息: 中医界元老杭州名医裘吉生逝世 [J]. 中医药情报, 1947(4): 3.
- [9] 裘吉生. 药物学金鸡纳霜考 [J]. 绍兴医药学报, 1908(1): 8.

- [10] 周寿人. 论金鸡纳霜治疟有无流弊 [J]. 南京医学报, 1912(5):36.
- [11] 包识生. 问答 [J]. 神州医药学报, 1914,2(1):2.
- [12] 包识生. 问答 [J]. 神州医药学报, 1914,2(8):8.
- [13] 谈愚叟. 问答: 请再详考金鸡纳霜之性质 [J]. 神州医药学报, 1914,2(9):4-5.
- [14] 包识生. 问答: 再答金鸡纳霜之性质 [J]. 神州医药学报, 1914,2(9):5-6.
- [15] 任养和. 答谈君再问金鸡纳性质 [J]. 神州医药学报, 1914,2(11):2-3.
- [16] 朱阜山. 药理学: 金鸡纳考 [J]. 神州医药学报, 1914,2(11):30-32,37.
- [17] 刘丙生. 药理学: 金鸡纳霜砒石治疟功用成效考 [J]. 神州医药学报, 1914,2(12):18-19,21-22.
- [18] 朱阜山. 答钱君存济信石质疑 [J]. 神州医药学报, 1915,3(1):10,12-13.
- [19] 钱存济. 朱君阜山信石辩 [J]. 神州医药学报, 1915,3(3):14.
- [20] 朱阜山. 再答钱君存济信石质疑 [J]. 神州医药学报, 1915(26):1-4.
- [21] 朱阜山, 中西医药研究社出版部. 信箱: 朱阜山先生来函 [J]. 中西医药, 1936,2(10):701-702.
- [22] 汤逸生. 金鸡纳之研究 [J]. 神州医药学报, 1915(29):36-37.
- [23] 段逸山.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总目提要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69.
- [24] 沈芳. 家庭医病法 [J]. 妇女杂志 (上海). 1915,1(3):12.
- [25] 于赓哲. 从疾病到人心: 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25.
- [26] 李经纬. 中医史 [M]. 修订版.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22:435.

(本文编辑 常馨月)